

康德论形而上学的结构： 一项基于历史语境的初步考察

宋博(SONG Bo)*

摘要：人们通常默认 18 世纪德国哲学不加批判地采纳了沃尔夫所发明的形而上学结构。然而，通过更为细致的检验，本文将论证，沃尔夫的后学都以独特的方式吸收了沃尔夫的形而上学框架，因而德国形而上学结构的历史演进呈现了超过预期的多样性。本文还将指出，反讽的是，是康德而非其他理性主义者，才将独断主义的形而上学重构至其最成熟的形式。此外，康德对形而上学结构的双重观念，尽管初看起来存在张力，但却是一贯的、可敬的。

关键词：形而上学结构；德国理性主义；康德

Kant on the Structure of Metaphysics: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Based on Historical Context

Abstract: It is widely assumed that the eighteenth – century German philosophy uncritically adopts the structure of metaphysics invented by

* 宋博：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讲师（SONG Bo, Lecturer,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Faculty of Humanities,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Wolff. On a closer examination, however, I would like to argue that Wolff's successors appropriate the Wolffian metaphysical framework in their own way, and thereby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metaphysics in Germany displays more diversity than expected. Ironically, it is Kant, rather than any other rationalist, who reconstructs the dogmatic metaphysics in its most developed form. Furthermore, Kant's twofold vision of the structure of metaphysics, albeit its *prima facie* tension, is consistent and respectable.

Key words: the structure of metaphysics; German rationalism; Kant

一 导言

康德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位于他哲学规划的中心^①。尽管中外文献不乏对康德和形而上学关系的各种研究,但对康德对形而上学结构的分析及其背后的历史演进却似乎缺乏认真的对待^②。学者通常直接进入康德的形而上学批判,同时不加质疑地接受了这样的看法:康德接受了沃尔夫以来形而上学的结构,将形而上学分为一般形而上学 (*metaphysica generalis*) 和特别形而上学 (*metaphysica specialis*),前者即为存在论,后者则包含心理学、宇宙论和自然神学。

这种研究现状不过是对莱布尼茨和康德之间德国哲学的漠视的一个缩影。其背后的一个原因是,如果将莱布尼茨或沃尔夫视为欧陆理性主义的

① 所有的康德著作都参考科学院版。《纯粹理性批判》的引用按照标准的 A/B 版和页码 (如 Axxx/Bxxx),其他康德著作的引用按照科学院版的卷数和页码引用 (如 AA x; xx)。汉语译文主要参考李秋零的《康德著作全集》,在术语上略有所改动 (比如本体论改为存在论,知识改为认识)。所引用的未能收录在《康德著作全集》中的康德未发表作品和来自于其他作者的一手文献暂由笔者自己译出。

② 一个少有的对德国理性主义形而上学结构源流的专门研究是 20 世纪中叶 Vollrath 于 1962 年发表的论文。Vollrath 的论文强调沃尔夫确立的形而上学学科结构的共通性和延续性,并在整个西方形而上学中考察这种结构的渊源。也就是说,它处理的主要是这种形而上学结构的“前史”,并将康德的德国理性主义视为一个稳固的整体。但是,包含此文在内的康德文献都缺乏对这种形而上学的“后史”的关注以及对德国理性主义具有的差异性的考察。

高峰，那么就会很自然地认为此后的德国理性主义哲学乏善可陈，不过是缺乏创见的拙劣模仿，或是琐碎贫瘠的经院哲学；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康德对理性主义形而上学的批判是如此的成功，以至于让人很自然地滋生这样的想法：既然康德已经成功地摧毁了理性主义形而上学，为何我们还要去关注一个已然被驳倒的学说？

但是，近年来康德学者们愈发意识到，理解康德哲学必须要在 18 世纪德国哲学的语境之下进行。这一语境之所以对理解康德哲学尤其紧要，不仅仅在于它是理性主义的牢固营地，更在于它是一切哲学传播的终端媒介。哪怕是来自于异域的传统，如英国经验主义和苏格兰常识哲学，也不得不在德国哲学业已形成的问题域中被接收和讨论。

下面这项对 18 世纪德国哲学中形而上学结构的考察有着双重意义：从形而上学自身角度而言，莱布尼茨—沃尔夫形而上学是对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传统强有力的现代表达，是西方形而上学系统化的重要阶段；从康德哲学角度而言，探索德国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结构对理解《纯粹理性批判》乃至康德整个理论哲学基本规划的结构大有裨益。

本文旨在考察从沃尔夫到康德的德语地区形而上学学科结构的历史演进。本文的重点是沃尔夫所确立的形而上学结构的“后史”，而非其“前史”，德国理性主义者之间的个性，而非其共性。本文设定了两个任务：（1）深入到作品当中考察德国理性主义者，如沃尔夫、鲍姆伽登，乃至克卢修斯各具特色的形而上学结构观；（2）阐述康德对这种形而上学结构吸收和重构，并以此展示康德思想的革命性和复杂性。

二 理性主义形而上学的结构

在形而上学发展历史上，人们广泛地认为，是沃尔夫将一般形而上学和特别形而上学这一区分决定性地引入到形而上学中。不过，这种看法的若干细节需要澄清。首先，沃尔夫并不是“一般形而上学”和“特别形而上学”这对术语区分的发明者。其次，沃尔夫在其作品中甚至很少（不是完全没有）使用这对术语。严格来说，沃尔夫只是在事实上区分了一般形而上学和特别形而上学，并成为推广这一学科区分的最有力者。在沃尔夫

哲学话语中活跃的反而是如存在论、宇宙论、心理学和自然神学等更加具体的形而上学分支的名称。因此,在研究 18 世纪德国形而上学结构时,最需要我们关注的不是一般形而上学和特别形而上学的两分法,而是上述形而上学分支的多分法。

沃尔夫对形而上学结构的奠基性贡献是确立了形而上学研究的四大题材:一般事物、世界、灵魂和上帝。其影响最大的代表作是《对上帝、世界和人类心灵、以及一般事物的理性思想》(*Vernünfftige Gedanken von Gott, der Welt und der Seele des Menschen, auch allen Dingen überhaupt*)。这部著作首先发表于 1719 年,并且多次再版。由于此书以德语写就,它以“德语形而上学”闻名于世。“德语形而上学”全书共分六章,分别名为:“第一章 我们如何认识我们存在和这种认识对我们有何用”(§ § 1 - 9)、“第二章 论我们认识和一切一般事物的诸第一原理”(§ § 10 - 190)、“第三章 论一般的灵魂,即,我们对它所知觉者”(§ § 191 - 539)、“第四章 论世界”(§ § 540 - 726)、“第五章 论灵魂一般的精神的本质”(§ § 727 - 927)和“第六章 论上帝”(§ § 928 - 1089)。其中第一章是对全书的导论,第二章处理一般事物,第三章和第五章处理灵魂,第四章处理世界,第六章处理上帝。显然,“德语形而上学”处理就是一般事物、灵魂、世界和上帝这四种题材,其写作结构完全按照书名所指定的研究对象而严格组织,并直接反映了作者本人的理论系统。此书包含了沃尔夫学派形而上学的基本规划,在德国哲学史上意义重大,不仅沃尔夫的前辈莱布尼茨的学说被组织进这个形而上学系统之中,他的后辈也大体都在这个框架内工作。

在“德语形而上学”中,沃尔夫并未从学科角度对这些形而上学题材进行命名,但他在随后的作品中试图进一步建立与之相应的分支学科。遗憾的是,尽管沃尔夫在这方面同样完成了最重要的奠基性工作,但在形式的整齐性上仍然未能臻于完善。在他用拉丁语所著的具有其哲学系统导论性质的《一般哲学的准备性谈话》(*Discursus praeliminaris de philosophia in genere*) (1728) 中,沃尔夫系统地引入了形而上学的分支学科,并进行了明确的定义。在该书的 § 79 中,沃尔夫明确宣称形而上学包含存在论、一般宇宙论和精神论 (*Pneumatik*) 这三个分支学科。沃尔夫依据研究对象给出如下定义:“因此形而上学是对存在、一般世界和诸精神的科学。”

[Wolff (1996: 85)] 因为精神论包含心理学和自然神学，沃尔夫形而上学的四分结构不难被推断出来，但这种推断性也表明这种四分结构尚未被充分主题化，并不总是明确而一贯。

在《一般哲学的准备性谈话》之后，沃尔夫共创作了五部关于形而上学分支的著作：“存在论”（1730）、“宇宙论”（1731）、“经验心理学”（1732）、“理性心理学”（1734）和“自然神学”（1736 - 1737）。这些以拉丁语写就的更加卷帙浩繁的形而上学更为详尽地发挥了“德语形而上学”的规划。从标题就可以看出，虽然这些著作截然区分了心理学和神学这两门精神学，但它们仍旧承接了“德语形而上学”对人类灵魂两分处理，心理学被分为经验心理学和理性心理学，这二者像是可以与诸如宇宙论和自然神学等科学相提并论的独立分支。形而上学的四题材具有若隐若现的五分结构，这一差异使得形而上学的学科区分在形式上不整齐划一。

沃尔夫的另外一大贡献是提出形而上学内部结构是线性序列。在《预备性谈话》的 § 99 中，沃尔夫认为存在论是第一哲学（*philosophia prima*），之后依次分别是宇宙论、心理学和自然神学。也就是说，不仅一般形而上学为特别形而上学奠基，而且特别形而上学内部之间也存在线性的单向依存关系。沃尔夫的依据是自然神学的原理出自于心理学，宇宙论和存在论，心理学的原理出自于宇宙论和存在论，而宇宙论的原理出自于存在论。因此，位于第一位的是存在论，第二位的是宇宙论，第三位的是心理学，第四位的是自然神学。[Wolff (1996: 109)]

鲍姆伽登是沃尔夫最为重要的追随者之一，同时他也被认为是沃尔夫的弟子当中最大的莱布尼茨派。通过剔除沃尔夫哲学中相当的经验主义元素，鲍姆伽登发展了更加精致的理性主义哲学，其代表作是他初次发表于1739年的拉丁语《形而上学》（*Metaphysica*）。该书共1000节，由一个简短的导论（§ § 1 - 3）和四个主体部分构成。四个部分依次是：存在论（§ § 4 - 350）、宇宙论（§ § 351 - 500）、心理学（§ § 501 - 799）和自然神学（§ § 800 - 1000），并且每个部分都包含一个简短的导论（*Prologomena*）。

鲍姆伽登的《形而上学》被康德用作其形而上学讲座的教科书，并贯穿了后者的整个教学生涯。毫无疑问，鲍姆伽登的《形而上学》直接而深

刻地影响了康德整个理论哲学的规划和《纯粹理性批判》的结构。康德《反思录》中的形而上学部分很多都源于他在《形而上学》教材中的批注。甚至可以说,莱布尼茨和沃尔夫中相当部分的哲学养分是通过鲍姆伽登的管道输入到康德哲学的血液之中的。鉴于鲍姆伽登的《形而上学》对康德理论哲学的重要性,下面我将花费较多篇幅来详细介绍鲍姆伽登对形而上学分支学科的分类和定义。我们会看到,即使作为最正统的沃尔夫派,鲍姆伽登对沃尔夫的形而上学观也并非全盘接受。

首先,在沃尔夫的基础上,鲍姆伽登充分主题化了并最终确立了存在论、宇宙论、心理学和自然神学这一形而上学的四分结构。这一形而上学的四分规划直接地反映在《形而上学》一书的布局中。对于沃尔夫的形而上学结构中题材四分和分支学科的三分或五分之间的矛盾,鲍姆伽登做了两个改变,从而使得他的形而上学大厦较诸沃尔夫有着更为整齐的结构和严谨的系统。第一,鲍姆伽登将经验心理学和理性心理学明确地归属为心理学的下属学科,从而最终确立了题材和科学一一对应的形而上学四分结构。在 § 503 中鲍姆伽登写道:“经验心理学和理性心理学肯定其诸论断 (1) 于真正的经验 [在这种情况下它是经验心理学]; (2) 于从一个相当长的推理线导出的灵魂的概念 [在这种情况下它是理性心理学]。” [Baumgarten (2013: 198)] 第二,鲍姆伽登还将经验的/理性的这一区分系统性地运用到一般宇宙论中,使得宇宙论也分为经验宇宙论和理性宇宙论。在 § 351 中,鲍姆伽登写道:“宇宙论……或是经验的,若从真正的经验中被导出,或是理性的,若从世界的概念中被导出。” [Baumgarten (2013: 166)] 尽管宇宙论实际上并未能按照经验宇宙论和理性宇宙论分别展开,但这仍使得特别形而上学内部在形式上保持了平行。

其次,鲍姆伽登将形而上学研究的焦点统一地汇聚到谓词上。《形而上学》的第一主干部分为存在论,鲍姆伽登将存在论定义如下:“§ 4. 存在论 [存在之智 (Ontosophy)^①, 形而上学, 见 § 1, 普遍形而上学, 建筑

① 在此前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在德国哲学界中“存在之智”(ontosophy)和“存在论”(ontology)可以互换地使用,沃尔夫推广了“存在论”这一术语。随着沃尔夫学派日益增加的影响力,“存在之智”这个术语才慢慢退出历史舞台,完全为“存在论”所替代。

术，第一哲学] 是一事物之一般谓词的科学。” [Baumgarten (2013: 100)] 此外，鲍姆伽登对一般宇宙论和心理学的定义也是以谓词为焦点，分别是“对世界的诸一般谓词的科学” [Baumgarten (2013: 166)] 和“对灵魂诸一般谓词的科学” [Baumgarten (2013: 198)]。作为唯一的例外，自然神学被定义为“上帝的科学在他能没有信仰而被认识的程度上” [Baumgarten (2013: 280)]。虽然鲍姆伽登没有明言自然神学是研究关于上帝的谓词的，但如果上帝是基于非信仰的认识，而认识似乎也只能通过谓词认识而别无他途。因而，说自然神学是关于上帝的谓词的科学似乎也并不无妥。因此，整个形而上学，不管是研究事物、世界、灵魂和上帝，都是对这些题材一般谓词的研究，因而形而上学的统一性通过谓词研究的统一性而得到了强化。

再次，鲍姆伽登给出了形而上学的新定义，并据此定义演绎地证明了何种学科是属于形而上学的。第一部分形而上学导论 (Prolegomena to Metaphysics) 十分简短，仅仅包含了三个小节，但却对理解形而上学学科本性和结构至关重要。鲍姆伽登在第 1 节提供了形而上学的基本定义，“§ 1. 形而上学是人类认识中的第一诸原理的科学” [Baumgarten (2013: 99)]。同时，鲍姆伽登在第 2 节给出了形而上学的范围：“§ 2. 存在论，宇宙论，心理学，和自然神学属于形而上学。” [Baumgarten (2013: 99)] 如果单单考察第 2 节，鲍姆伽登对形而上学诸学科的论断在此只是一个先行的肯定，还未能得到辩护。但如果同时考察《形而上学》的第 1 节和第 2 节，一个直言三段论便呼之欲出。第 1 节作为形而上学的定义可以视为三段论中的大前提，第 2 节作为形而上学的范围则可以理解为三段的结论，那么，我们还欠缺一个小前提。按照这个小前提，存在论、宇宙论、心理学和自然神学都可被三段论的中词“人类认识中的第一诸原理的科学”所真述谓。随着各个形而上学分支的展开，鲍姆伽登对存在论、宇宙论、心理学和自然神学的定义如下：

§ 5. 一事物之更一般的诸谓词是人类认识的诸第一原理，因此存在论恰如其分地属于 (§ 2) 形而上学 (§ 1, 4)。 [Baumgarten (2013: 100)]

§ 352. 宇宙论, 其包含了心理学、神学、物理学、目的论和实践哲学的诸第一原理, 恰如其分地属于 (§ 2) 形而上学 (§ 1)。
[Baumgarten (2013: 166)]

§ 502. 心理学, 其包含了神学、美学、逻辑的和实践的科学的诸第一原理, 恰如其分地 (§ 501) 属于 (§ 2) 形而上学 (§ 1)。
[Baumgarten (2013: 198)]

§ 801 自然神学包含了实践哲学、目的论和启示神学的诸第一原理, 因此, 它恰如其分地属于 (§ 2) 形而上学 (§ 1)。
[Baumgarten (2013: 280)]

有趣的是, 这些定义的谓词都是某学科的“诸第一原理”, 它们的合取恰好构成了上述三段论所缺少的小前提, 鲍姆伽登凭此为第 2 节中形而上学结构论断提供了简单却严格的演绎证明。读者或许会注意到, 鲍姆伽登这里对于形而上学的“第一原理”定义似乎与前面我们通过归纳得出的形而上学的“谓词”定义相左。但事实上这两个刻画并不冲突。在存在论部分, 鲍姆伽登将他形而上学定义中所参照的“原理”概念定义为对于“对一事物更为一般的谓词” [Baumgarten (2013: 100)]。这个在存在论中的局部定义应当可以延伸和运用到特别形而上学中。如果这样, 形而上学作为诸第一原理的就可以还原为形而上学作为谓词的科学。

最后, 鲍姆伽登的对形而上学学科归属的论证还迫使他继承了沃尔夫的线性奠基的看法。存在论、宇宙论、心理学和自然神学所包含的第一原理的科学在数目上依次递减, 因而, 存在论为宇宙论奠基, 宇宙论为心理学奠基, 心理学为自然神学奠基, 自然神学为其他学科奠基。此外, 鲍姆伽登还暗示, 之所以哲学中的其他学科如实践哲学、目的论和启示神学不属于形而上学, 正是因为它们其中之一不再包含其他科学的诸第一原理, 因而不符合形而上学的定义。在效果上, 鲍姆伽登不仅论证了存在论、宇宙论、心理学和自然神学属于自然形而上学, 他还论证了仅有这四门学科属于形而上学。

这种形而上学的四分结构不仅在正统的沃尔夫学派中流行, 甚至也保留在其敌对阵营之中。克卢修斯属于虔敬宗传统的托马斯乌斯派, 他是 18 世

纪上半叶沃尔夫派的最重要反对者，也是康德“批判转向”的重要催生者之一。尽管如此，他的形而上学系统仍然严守沃尔夫学派四分结构的基本规划，这明白无误地表现在其形而上学代表作《诸必然理性真理的纲要》（*Entwurf der Nothwendigen Vernunftwahrheiten*）中。在序言中，克卢修斯写道：“按照其他学者所设的榜样，我们当前的形而上学已经被分为四门科学，即，存在论，理论自然神学，宇宙论，和精神论。” [Watkins (2009: 137)] 据此，全书的结构分为四个部分，分别为存在论、理性自然神学、宇宙论和精神论，其所预设的形而上学的四分题材并无实质变化。

尽管接受了沃尔夫学派的框架，克卢修斯仍做出了一些独具特色的调整。首先，形而上学研究对象获得全新的表达。克卢修斯认为不同的学者提出不同的形而上学概念，但他自认为存在一个可以统摄这些不同概念的形而上学普遍概念，即“形而上学应该处理诸必然真理” [Watkins (2009: 138)]。其次，心理学改称为精神论。按照莱布尼茨和沃尔夫，不管是心灵还是上帝都属于精神。在沃尔夫哲学中，心理学和自然神学都属于研究精神的精神学。现在克卢修斯将精神相应的精神论概念窄化了，不过这仅仅是一个名称的变化。最后，特别形而上学的内部结构发生变化。克卢修斯将理论自然神学置于心理学和宇宙论之前，因而改变了沃尔夫学派中形而上学内部的线性次序，因为他认为后两者的对象属性要参照和预设上帝的完善和属性 [Watkins (2009: 137)]。如此一来，克卢修斯发展了一种不同于沃尔夫和鲍姆伽登的特别形而上学的结构。

三 康德的两种形而上学结构

康德的思想不仅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而且具有高度的复杂性。为了简化问题，本文中所讨论的康德思想将被限定为《纯粹理性批判》和为了解此书所不得不参照的一些其他时期的写作。我的基本看法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了两种不同的形而上学结构，其中第一个种结构我们较为熟悉，而第二种结构则易被我们忽视。下面我将依次考察康德所提到的这两种结构。

首先必须要说明的是，康德突破了沃尔夫对形而上学的题材范围的设

定,从而剧烈地改变了沃尔夫以降的形而上学框架。在德国理性主义者中,不管是正统的沃尔夫派还是其反对者,形而上学都被假定为是理论哲学的范围。^①康德却认为形而上学分为自然的形而上学和道德的形而上学,自然和自由即是形而上学的两大对象。沃尔夫所确立的形而上学研究的四大对象被统摄到一个更高的自然概念之下,此自然概念关涉“存在的一切”,而不关涉“应当的存在的一切”。(A840/B868)在康德这里,思辨理性的形而上学(即理论哲学)仅仅是狭义的形而上学。(A842/B870)但是,只有在同等的题材范围内进行对比,康德的独具匠心之处才能更为彰显。因此,下面我们就将形而上学默认为更为狭义的思辨形而上学,并在这一范围内讨论康德对德国理性主义形而上学的结构的接受和改造。

基于上面对德国哲学中形而上学结构的考察,我们有理由期待康德会遵循沃尔夫传统下的形而上学的学科规划和内容界限。如前所言,在德国哲学话语中,一般形而上学和特别形而上学的两分结构虽然基础,但并不活跃。同样地,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也没有明确区分一般形而上学和特别形而上学^②,而是彰显了形而上学的四分结构。对于存在论,康德写道:“自以为能在一个系统的学说中关于一般之物提供诸先天综合认识的存在论(例如因果性原理),其自负的称号必须让位于仅仅一种纯粹知性的分析论的谦逊称号。”(A247/B303)这段话虽然意在高扬先验哲学,但也预设了被批判和被取代的存在论这门科学。先验辩证论更是明确地阐述了心理学、宇宙论和自然神学。(A334/B391)

康德所理解的形而上学结构离不开批判哲学的规划。康德的批判哲学具有双重任务:它不仅包含了康德对独断主义形而上学的批判,也预设了对康德所批判的标靶学说的接受。在树立自己的批判靶子时,康德并未照搬理性主义者的学说,相反,康德严格且有力地重构了自己对手的形而上学,并试图穷尽它们的哲学潜力。正如下面我们会看到的那样,康德不仅

① 沃尔夫也认为一般的实践哲学中包含形而上学原理,但他似乎并未将此视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见 Wolff (1996)。

② 但是在其他文本中,康德确实做出了这一区分。比如,在《反思》R4851(AA 18:9)中的树形图中,我们就能找到这种看法的依据。

仅是理性主义形而上学道路的最大背离者；事实上，即使是沿着理性主义的道路，康德也堪称最勇敢探索者，比他所反对的任何人都走得更远。康德深知，理性主义唯有穷其所能，批判哲学方可逞其所欲。

首先，虽然康德并未改变（狭义）形而上学的题材，但他却为此进行了重新奠基。康德认为科学和人类的认识能力之间具有系统的内在关联性。形而上学不是无本之木，它建立在人类认识能力的基础之上。具体而言，一般形而上学建立在知性之上，特别形而上学建立在理性之上。虽然沃尔夫也强调形而上学和认识能力的联系，但康德这里做了更加具有主体性面向的一个决断。康德认为每个特别形而上学的对象和三段论推断的三种方式之间是系统对应的，且特别形而上学的对象可以依赖于前三段论的形式而演绎出来。与直言三段论相应的前三段论可以演绎出灵魂的概念，与假言三段论相应的前三段论可以演绎出世界的概念，而与选言三段论相应的前三段论可以演绎出上帝的概念。既然有且仅有三种三段论形式，那么特别形而上学也有且仅有三个对象。虽然康德也同意一般形而上学为特别形而上学奠基，但前三段的演绎方式似乎暗示了灵魂、世界和上帝这三个特别形而上学的对象是相互独立的，这冲击了沃尔夫和鲍姆伽登所认为的特别形而上学内部的线性依存关系^①。

其次，康德将形而上学分支的内容理性主义化了。虽然康德仍然接受灵魂、世界和上帝作为特别形而上学的三大题材，但他严格将经验心理学和经验宇宙论排除在外。如前所言，经验心理学在沃尔夫和鲍姆伽登的形而上学系统中都占据一席之地。对于以“第一原理”去定义形而上学的鲍姆伽登而言，这是不成问题的。但康德认为形而上学关注先天认识(A841/B869)^②，因此他明白无误地将经验心理学这一分支驱逐出形而上

① 康德在引入理性心理学、理性宇宙论和先验神学的对象时，也是按照客体划分的。具体而言，康德是按照表象的语义指称所仅有的三种可能的对象：指称主体，指称作为显现的客体，指称作为一般思想的对象的客体。(A333-334/B390-391)

② 康德对形而上学内涵的理解似乎直接受到了克卢修斯的影响。康德通过先天认识而非谓词去理解形而上学的任务，而他的先天认识概念响应了克卢修斯的必然真理概念。当然这不是对于康德形而上学观念转变的唯一影响或互动元素。康德及其同代的门德尔松、兰伯特等人都捍卫共同的启蒙理想和哲学尊严。比如，兰伯特也同样坚持一种先天概念的哲学，见 Watkins (2018)。

学，将其贬斥为应用哲学的一部分。(A848/B876)

康德不仅驱逐了经验心理学，还纯化了理性心理学。沃尔夫试图通过理性和经验的联姻来实现它的哲学理想，这最显著地表现在其心理学之中。这种倾向也为鲍姆伽登所继承。二者的理性心理学内部都名不副实地掺杂了经验要素。吊诡的是，只有在康德这个理性主义形而上学最无情的批判者那里，我们才能找到名副其实理性形而上学。康德坚持，任何经验要素的掺杂都会让理性心理学退化为经验心理学 (A342/B400)。正如康德所言：“因此，我思是理性心理学的惟一解说词，它应当从中展开自己的全部智慧。”(A343/B401) 得益于将理智的我思和经验的内感的严格区分和对理性主义哲学概念分析方法的清晰认识，康德贯彻了理性心理学所设立的原则，发展了符合理性主义期待的理性形而上学。这让康德不单在名义上，还在实际上和任何经验心理学划清界限。^①

最后，康德让形而上学分支的内部学说结构也系统化了。在理性心理学中，理性心理学仅仅包含以范畴为线索建立的仅有四个命题：非物质性、不坏性、人格性和不朽性。(A345/B403) 在自然神学中，按照先天和后天的区分，关于上帝存在的存在论论证被归类为从概念出发的论证，物理—神学论证和宇宙论论证被归类为从经验出发的论证。在两个经验论证中，前者被理解为从规定的经验出发，后者则从未规定的经验出发。基于这种系统性区分，康德深信这是仅有的三种证明上帝的存在的方式。(A590 - 591/B618 - 619) 这些都是仅见于康德哲学，而不见于德国理性主义者的系统化步骤。

尽管这是我们最熟悉的康德所论及的形而上学结构，但这绝非康德所提到的唯一的形而上学结构。在《纯粹理性批判》方法论的建筑术部分，康德提出了一个似是而非的形而上学结构，这一结构甚至在题材的内容上都偏离了沃尔夫传统。康德明确的写道：“形而上学的整个体系由四个部分组成。1. 存在论。2. 理性自然学。3. 理性宇宙论。4. 理性神学。第二个部分，即纯粹理性的本性学说，包含着两个分支，即 *physica rationalis*

^① 正如 Dyck (2014) 所强调的，是康德，而不是任何理性主义者，发展了真正的理性主义形而上学。

[理性物理学] 和 *psychologia rationalis* [理性心理学]。” (A846 - 847/B874 - 875) 相比于以上讨论的形而上学结构, 这段文本出于两个理由容易被人忽视。第一, 它位于方法论部分, 而方法论部分相比于要素论部分似乎无足轻重^①; 第二, 它和我们熟悉的形而上学结构相差无几, 因此容易被读者不经意地忽略。

但是, 这一“方法论”形而上学结构与“要素论”形而上学结构至少存在两个值得探讨的显著差异。首先, 康德主张特别形而上学包含理性物理学。一方面, 康德不仅用理性自然学取代了理性心理学, 使其与宇宙论和自然神学相提并论; 另一方面, 他还引入理性物理学, 使之与理性心理学都成为理性自然学的分支学科, 这相当于提出了特别形而上学的四分结构。似乎是受到沃尔夫派中笛卡尔要素的影响, 康德的这一举动让形体和心灵的二元区分变得显著起来。

其次, 康德宣称理性心理学是内在的。在先验辩证论中, 康德认为知性概念和原则的使用是内在, 而理性概念和原则的使用是超越的。(A296/B352) 因而理性心理学是超越的。在建筑术中, 虽然康德仍认为理性宇宙论和理性神学是超越的, 但却主张理性心理学和理性物理学所属的理性自然学是内在的。(A845 - 846/B843 - 874) 因而理性心理学是内在的。因此, 在理性心理学和经验的关系的定位上, 建筑术中所言也和辩证论中的所言相悖。尽管有这些冲突, 康德仍然很强硬地宣称这种结构划分的建筑术是不变的和规定性 (A847/B875), 这似乎表明了这种形而上学结构具有最高等的权威性。

现在的问题是, 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这些差别和冲突。一种回应或许是这样的, 在建筑术中康德直接将他前批判时期的笔记纳入了《纯粹理性批判》, 因此前批判时期和批判时期的概念和结构未能得到统一。这种看法可以同时得到考证和理论上的支持。从文本上说, 建筑术中的这种形而上

^① 对先验方法论的轻视几乎是一种共识。比如 A. W. Moore (2010) 给出了处理先验方法论的篇幅方面的一些例子, Norman Kemp Smith 在他的 650 页评论中只花了 20 页, Graham Bird 在 850 页的 *The Revolutionary Kant: A Commentary on 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中也只花了 20 页来说明此事。

学的结构划分在之前所提到的追溯到 1776—1778 年的笔记 R4851 中已经出现。通过对比可以发现, R4851 中的形而上学结构的树形图被康德的建筑术几乎原封不动的接收。从理论上说, 这种提案在诉诸 Adickes 等人提倡的拼凑物理论 (patchwork theory)^①。按照拼凑物理论, 《纯粹理性批判》的素材来源于康德不同时期的想法和写作片段, 因而在术语和内容上有不少相左之处。诉诸拼凑物理论, 本质上是试图将共时性的差异还原为历时性的发展, 从而消解系统的内在冲突性。

尽管这种诠释能轻易解释上述种种不一贯之处, 但它付出的一个理论代价是预设了存在类似于“真正的康德哲学”这样的价值判决。按照这种诠释, 辩证论中的形而上学观才是对批判哲学精神的最好表达, 而建筑术中的形而上学观不过是偶然地被纳入《纯粹理性批判》的前批判时期的残余而已。但是, 这种诠释却在文本上难以立足。康德在晚期笔记 R6338a 中说明, 他并未抛弃这种源自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看法。在追溯到 1794 年和 1795 年之间的 R6338a 中, 康德写道: “先验哲学或本质学说之后紧随着关于按照先天诸原理的诸经验对象的自然学 (形而上学): 形体的学说和灵魂的学说。它们之后, 宇宙论和神学。” (AA 18: 663)

康德这里的基本意思很清楚, 先验哲学先于 (形而上学的) 自然学, 即物理学和心理学, 而物理学和心理学又先于宇宙论和神学。从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首先, 康德延续了建筑术或 R4851 中的基本论断, 引入了形而上学的 (或理性的) 自然学, 并将物理学和心理学归摄其下。康德还肯定, 形而上学的自然学是关于“诸经验对象”的, 因而是内在的。这已足以说明康德将 R4851 这种形体/灵魂二元论色彩更重的形而上学结构写入《纯粹理性批判》并非无心之失。此外, 康德还对这种形而上学结构

① 拼凑物理论主要是用来解释 1781 年的《纯粹理性批判》的。两方面的考虑构成了这种假说的主要动机: 一方面, 康德完成第一版《纯粹理性批判》所花费的写作时间之短令人难以置信; 另一方面, 在第一版批判中不少段落能直接在康德以前的手稿中找到对应。拼凑物理论的首倡者为德国著名的康德专家 Hans Vaihinger (1881-1882) 和 Erich Adickes (1929), 后由英语世界著名的康德专家 Kemp Smith (1923) 采取并推广。但拼凑物理论随即遭到另一位著名的康德研究者 Paton (1936) 的猛烈批评。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康德研究复兴的浪潮中, Robert Paul Wolff (1963) 提出了一个更加温和版本的拼凑物理论来解释第一版演绎中的论证层级。

做了进一步阐发。康德不仅说明了内在的理性物理学和理性心理学不同于超越的宇宙论和神学，而且他还标志出了前者先于后者的学科次序。同时，康德似乎还在暗示从自然学到宇宙论和神学的过渡中也存在分别的对应关系：即物理学之后是宇宙论，心理学之后是神学。物理学向宇宙论中过渡是德国主流理性主义形而上学所承认的关系。从心理学到神学过渡这一想法虽不见于德国理性主义形而上学，但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从心灵上升至上帝这一经典的笛卡尔路线。因此，不妨说康德发展了一种结合了德国沃尔夫派和法国笛卡尔派的树形形而上学结构。

如果 Adickes 对 R6338a 的时间定位是可信的，那么这则笔记的写作正处于所谓的“后批判时期”^①。此时三大批判业已发表，康德正在忙于填补他批判哲学系统中的最后一个空缺：从形而上学到物理学过渡。如此一来，上述那种将方法论中的形而上学结构视为前批判的残余的诠释便显得十分可疑。因为我们很难想象，后批判的康德会重拾他早已抛弃的前批判哲学中的思想。

一个更为合理的诠释是，康德对特别形而上学结构的两种看法并非完全相互替代，二者之间仍有相互兼容和相互补充的余地。沿着这种诠释方向，一个尝试性的提议是，康德的两种形而上学结构观是基于两种不同的逻辑。一方面，康德可以按照前三段论形式去先天地演绎出特别形而上学的三个对象，这一演绎打上了康德以三为特色的逻辑学烙印；另一方面，康德可以按照更为传统的逻辑二分法探查客体概念的差异，进而确立形而上学对象。首先，康德可以通过内在于经验和超越于经验进行第一重划分。（A845/B873）按照笛卡尔对于灵魂和形体的二元区分，灵魂的本质在于思想，形体的本质在于外延，这一点被康德毫无保留地接受。（A371）“灵魂”和“形体”这两个概念不仅对笛卡尔而言是不重叠的，而且对康德而言也是互斥的。（AA 2：85）不同于笛卡尔，康德进一步将灵魂和形体同人类的认识能力联系起来。他主张灵魂是内感的对象，而形体是外感的对象。（A846/B874）因而，康德可以据此进行理性自然学内部的第二

^① 后批判时期通常指称康德在 1790 年发表的《判断力批判》之后的哲学探索时期。Eckart Förster 最先提出了这一术语，见 Förster（1989）。

重划分。总体而言，这种进路似乎在按照客体概念内涵区分形而上学对象和结构，但它仍然不能脱离主体的认识能力。因此，它不宜轻易被贬斥为前批判的残余，而应当被视为康德丰富思想的侧影。

四 结语

这样一项对形而上学结构历史演变的考察能益于展现理性主义形而上学和康德哲学沿革关系的一个侧面。在此康德的批判哲学和德国理性主义哲学的深刻亲缘性这一泛泛论断，可以获得更加充实的意义。同时，在探索文本的过程中，诸多哲学家的细腻之处也得到了澄明。这不仅帮助我们修正德国理性主义者千人一面的刻板印象，同时也让我们站在一个新位置去理解康德哲学自身的革命性和立体性。

参考文献

- 康德, 2004: 《康德著作全集》(第3卷), 李秋零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康德, 2005: 《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 李秋零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Adickes, E., 1929: *Kants Lehre von der Doppelten Affektion Unseres Ich als Schlüssel zu Seiner Erkenntnistheorie*, Tübingen: Mohr.
- Baumgarten, A., 2013: *Metaphysics: A Critical Translation with Kant's Elucidations, Selected Notes, and Related Materials*,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
- Corr, C. A., 1975: "Christian Wolff and Leibniz",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36, 241 - 262.
- Dyck, C., 2014: *Kant and Rational Psych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örster, E., 1989: "Kant's Notion of Philosophy", *The Monist* 72, no. 2, 285 - 304.
- Kant, I., 1902: *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 (Vols. 1 - 29), ed. by Berlin - Brandenburg (formerly: Royal P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 Moore, A. W., 2010: "The Transcendental Doctrine of Method", Guyer, P.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aton, H. J., [1936] 1970: *Kant's Metaphysic of Experience*, 2 vol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 Smith, N. K., [1923] 2003: *Commentary on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Vaihinger, H. , 1881 - 1882: *Commentar zu Kant's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2. Bd. , Stuttgart: W. Spemann.

Vollrath, E. , 1962: “Die Gliederung der Metaphysik in eine *Metaphysica generalis* und eine *Metaphysica specialis*”,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sche Forschung*, Vol. 2, 258 - 284.

Watkins, E. , 2018: “Lambert and Kant on Cognition (Erkenntnis) and Science (Wissenschaft)”, Dyck and Wunderlich (eds.): *Kant and his German Contemporaries: Volume 1, Logic, Mind, Epistemology, Science and Ethics*, 17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atkins, E. (ed.), 2009: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Background Source Materia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olff, C. , Gawlick, G. & Kreimendahl, L. , 1996: *Discursus praeliminaris de philosophia in genere/Einleitende Abhandlung über Philosophie im Allgemeinen*, Stuttgart - Bad Cannstatt: Frommann - Holzboog.

Wolff, R. P. , 1963: *Kant's Theory of Mental Activi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